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4年第7期（总第32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4年11月

中心动态

- 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参加2024世界中文大会.....2
- 党委副书记杨海英赴长沙参加中国-老挝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第二次理事大会.....3

东盟资讯

- 中国国家主席同印尼总统会谈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5
-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在昆明举行 中国总理提四项合作建议.....7
- 中国广西推动口岸开放发展 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大通道.....9
- 携手打造数字丝路 中柬数字经济合作论坛规划发展合作蓝图 10
- 云南积极打造绿色澜湄合作样板.....14

国别研究

- 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反思.....17

热点分析

- 东盟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开拓.....33

◎中心动态

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参加 2024 世界中文大会

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持续蓬勃发展，推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11月15日至1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共同承办的2024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主持大会开幕式。本次大会以“联通融合、传承创新”为主题，来自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府官员、校长、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出席会议。我院国际中文教研室赵岩老师前往北京参会。

此次大会涉及中文水平考试（HSK）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国际中文教育标准研发与应用、国际中文教育学术体系构建与实践创新、2024中海语言文化论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和体系构建、中文水平考试（HSK）等语言测评应用与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人才培养、数智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新形态发展等多个主题论坛内容，并设HSK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展区、资源及数字化展区、中文联盟、孔子学院20周年教材展等展区，吸引了来自众多国内外机构和人员参展。

我院参会教师从本次大会中受益良多，不仅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最新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中文+职业技能”等相关的前沿信息，而且

对职业院校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中文水平考试与国际学生应用型人才培养有了新思考。同时此次大会也为我院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工作指明方向。下一步，学院将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中文+职业技能”等主题培训，践行职业教育“走出去”使命，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职教力量。（来源：国际教育学院）

党委副书记杨海英赴长沙参加中国-老挝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第二次理事大会

9月23日，YOUTH SHOW“中文+跨境电商”中外青年职业技能训练营的开营仪式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家俊，铜仁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天明，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院长邓振华，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曹登科出席开营仪式。来自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人民联合党、黎明职业大学及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等十三个国家的中外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了一段跨文化交流与技能提升的新篇章。

11月24日，中国-老挝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第二次理事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来自全国20余高职院校的80余名代表参会，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工学院机电教研室主任初光勇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中，联盟理事长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对2024年度联盟工作作总结报告，老挝教育与体育部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森·坎蒙介绍了2025年度合作需求，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作为副理事长单位代表向大会作中老职业教育优秀案例经验分享。大会现场发

布了一批老挝职业教育标准开发项目和老挝国家教材开发项目建设院校名单。我院被大会推选为中国-老挝职业教育产教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联盟向我院颁发了机电一体化老挝国家教材开发项目授权证书。

此次会议上，我院向联盟院校展示了与老挝教育交流与合作办学的成果，加深了与国内外联盟院校的联系；了解了联盟下步工作思路，为明年及后续扩大和深化与老挝教育交流与合作拓宽了思路。今年年底至明年5月份，我院将根据联盟大会指引的工作方向，加快双语教材和职业标准开发和建设进程，按计划完成有关工作任务，大力推进并完成黔匠—东盟学院（老挝）的挂牌和成立工作。（来源：铜仁职院新闻网）

◎东盟资讯

中国国家主席同印尼总统会谈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

2024年11月9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普拉博沃总统在今年3月当选总统后第一时间首访中国，正式就职后又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体现了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坚持战略自主、互信互助、合作共赢、公平正义，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尼关系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中方愿同印尼新政府一道，继往开来，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续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更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和政府、立法机构、地方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要进一步完善战略合作布局，打造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运营好雅万高铁，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合作，加强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开展海上共同开发合作，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实现融通发展，推进各自现代化。中方也愿同印尼共同打造更多惠民工程，加强减贫、医药、粮食种植、

渔业等领域交流合作，为印尼科研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支持，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扩大人员往来。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中国和印尼要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印尼开展更紧密多边战略协调，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印尼和中国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印尼希望进一步强化同中国全方位战略协作，成为更加紧密的全面战略伙伴，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这将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亚洲地区更好实现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印尼愿同中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五大支柱”合作格局，加强基础设施、能矿、医药、农业、住房、海上共同开发、粮食安全、减贫等全方位全产业链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印尼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所作努力。涉疆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印尼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定支持中方为维护新疆发展稳定所作努力。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主持公道正义。印尼坚持独立自

主，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或“小圈子”，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水利、矿产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仪式。天安门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印尼两国国歌。普拉博沃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来源：东盟头条）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在昆明举行 中国总理提 四项合作建议

2024 年 11 月 7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昆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政府首脑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出席。

李强表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立 30 多年来，日益成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商合作、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更要紧密团结协作，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把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坚定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安宁、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李强就深化区域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推进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双向开放，完善开放型区域经济架构，打造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超大市场。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实施，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二是突出创新引领，加强创新政策对接协同，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撑和保障创新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推动区域电网规划建设和升级改造，深化新能源电池、汽车和光伏产业合作，拓展清洁能源、智能制造、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合作，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新动能。

三是深化融通建设，深入推进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强在政策、法律、监管、规则、标准等领域“软联通”，努力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便利，积极打造更多跨境合作示范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决定面向湄公河五国颁发“澜湄签证”，为符合条件的商务人员签发5年多次来华签证。

四是密切沟通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力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同澜湄合作、三河流域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机制协调发展，构建包容互促的良好合作氛围。加强与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合作，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落实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与会各国领导人和有关机构负责人高度赞赏中国在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共同努力，加强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沟通对接，保持开放合作，聚焦创新发展，拓展经贸、农业、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医疗卫生、旅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包容可持续发展，推动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会议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宣言》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2030 创新发展战略》等成果文件。（来源：东盟头条）

中国广西推动口岸开放发展 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大通道

11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提供的信息显示，广西将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机遇，增强陆海双轮驱动、水陆空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推动口岸开放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广西地处中越边境，有3市8县(区)与越南接壤，友谊关、东兴、钦州港等口岸，均是中国通往东盟的便捷通道。广西商务厅介绍，国家验收组日前完成验收工作，同意广西硕龙公路口岸对外开放和扩大开放、水口公路口岸扩大开放。硕龙公路口岸位于大新县硕龙镇，临近“亚洲第一跨国瀑布”——德天瀑布，此次扩大开放，有利于硕龙公路口岸成为跨境旅游重要通道，拉动当地特色旅游业发展。

水口公路口岸位于龙州县，是中国通往越南便捷的陆路口岸之一，先后获得进口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水口公路口岸扩大开放后，具备多项政策叠加优势，将为龙州县发展铝循环、绿色材料、食品加工等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今年以来，广西稳步推动口岸扩大开放，推动友谊关—友谊国际口岸扩大开放至浦寨—新清、弄尧—谷楠通道，并正式运行，峒中口岸—横模口岸(含里火通道)正式对外开放，以及11个海港口岸码头泊位对外开放。同时，广西加快智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中越友谊关—友谊货运专用通道、浦寨—新清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实现试运行。

经过多年发展，广西口岸已形成数量多、类型全、范围广、效率高、增长快的特点，在服务广西开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今年前三季度，广西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55亿吨，同比增长14.6%。

广西商务厅表示，接下来，广西将以中越边境智慧口岸建设为牵引，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提高通关便利度，推动口岸物流升级发展，保障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来源：中新网）

携手打造数字丝路 中柬数字经济合作论坛规划发展合作蓝图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中柬双方将携手打造数字丝路，在数字基础设施、5G网络、电子商务、数字支付等方面深入合作，推动柬埔寨在数字经济领域快速进步。2024年11月4日，中国—柬埔寨数字经济合作论坛暨中国商会数字经济行业分会揭牌仪式在柬埔寨金边隆重举行，规划中柬两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合作蓝图，推动两国数字经济合作迈向新台阶。

柬埔寨副首相兼财经大臣安蓬·莫尼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柬埔寨中国商会会长林士强，柬埔寨中国商会数字经济行业协会会长陶光耀，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公使衔参赞常健，柬埔寨相关政商界

高层、专家学者及中资企业代表等 300 余人参加。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在致辞中表示，数字经济合作在中柬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他说，自中柬建交以来，友谊日益深厚，战略合作持续深化。柬埔寨中国商会数字经济行业分会成立，预示着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将迎来更加紧密、深入的合作，为中资企业在柬埔寨的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汪文斌说，数字社会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

汪文斌希望今天成立的柬埔寨中国商会数字经济行业分会，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中柬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引领企业探索新机遇，应对挑战，提升竞争力，同时促进民间友好交流，为中柬经贸关系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柬埔寨副首相兼财经大臣安蓬·莫尼拉表示，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并将其列为“五角战略”优先关键目标之一。数字经济合作框架下，尤其是电子支付、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中柬贸易交易和投资总额得以逐年增长。

安蓬·莫尼拉说，柬埔寨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携手中方打造“数字丝路”。本次论坛及数字经济行业分会的成立，是对中柬数字经济合作的又一充满前瞻性的信心之举。他希望这个平台能坚持下去，让更多公司和结构能参与其中，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广阔机遇，共同推动中柬友谊不断深化，实现共同繁荣。

林士强会长对推动中柬数字经济合作提出五点倡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政策对接，构建合作机制；二是推动产业合作与创新，在电商、智慧城市、5G 等领域打造示范项目，强化人才支撑；三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四是加强国际交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五是成立中柬数字经济合作联盟，共同谋划发展蓝图。

对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的重要作用，柬埔寨数字经济和商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TAING Nguonly 博士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中资企业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通过数字化赋能和创新应用，推动了柬埔寨各领域的数字转型，也为柬埔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培养了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

“数字贸易将成为柬埔寨多个产业的经济增长引擎。”柬埔寨中国商会数字经济行业协会会长陶光耀对此充满信心。

陶光耀是华为东南亚多国管理部总裁兼华为技术（柬埔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他在《柬埔寨数字经济的前瞻性洞察》主题分享中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正推动柬埔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他表示，数字经济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15% 增长到 2024 年的 41%，10 年间增长了 166.7%。到 2025 年，预计数字经济将占到全球 GDP 的近一半，显示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陶光耀预测，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占比会从当前的 6% 左右，到 2030 年超过东盟的平均水平 15%，在 2035 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0%。

数字经济提供大量新兴就业机会，数字贸易将成为柬埔寨多个产业的经济增长引擎。随着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柬埔寨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增长显著，智慧城市和智慧农业的推进也极大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

陶光耀特别提到 ICT 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呼吁中柬持续深化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贸易共同发展。他建议柬埔寨进一步发展 ICT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给数字化包容和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成为柬埔寨五角战略的重要“赋能者”和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

在当天的活动上，专家和企业代表还围绕“助力柬埔寨迈向数字化经济时代”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回顾中柬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5G 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数字支付等合作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分享的视角，积极探讨公私营部门如何支持和参与柬埔寨数字经济发展。大家一致认为，中柬两国的数字经济合作不仅对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深远意义，更将为东南亚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打造出又一个成功案例。

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公使衔参赞常健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RCEP 生效的背景下，中柬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将更加紧密。他期待和柬埔寨合作伙伴继续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5G 与新技术、电子商务与数字支付、人才培养与交流、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合作，携手共创数字经济的美好未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数字经济作为柬埔寨政府“五角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在中柬两国日益深化的友好合作中，得到快速发展。嘉宾们表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中柬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5G网络、电子商务、数字支付等方面深入合作，推动柬埔寨在数字经济领域快速进步，数字经济已成为中柬两国经济联系的新增长点和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来源：东盟头条）

云南积极打造绿色澜湄合作样板

2024年是澜湄合作倡议提出10周年，澜湄合作成为地区合作的“金色平台”。环境合作作为澜湄合作的重要领域，绿色已逐渐成为澜湄合作的鲜明底色。

近年来，云南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充分发挥“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云南中心”平台作用，与湄公河国家开展了生态环境治理、环境能力建设、环境技术援助、公众环境教育等务实合作，巩固互联互通基础，拓展环境合作领域，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云南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

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作用凸显

云南地理位置独特，生态资源丰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合作、“澜湄环境合作”的不断推进，云南生态环保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合作水平不断提升，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作用更加凸显。随着滇老合作走深走实，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老挝南塔省、琅勃拉邦省资源和环境厅建立合作机制，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针对老

挝当地环境挑战较大、民生需求较高的领域实施完成了“中国云南省—老挝南塔省环境保护交流合作技术援助项目”“中国云南省—老挝琅勃拉邦省环境保护交流合作能力建设技术援助项目”“中国云南省—老挝琅勃拉邦省环境交流合作农村垃圾处理示范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垃圾处理示范工程项目”）“中国云南省—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清洁饮用水项目”等一批示范项目。

其中，垃圾处理示范工程项目为老挝琅勃拉邦省 16 个村庄的 9000 余人提供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置示范；两个清洁饮用水项目解决了 4000 多名老挝师生日常饮水难题。项目的实施为当地民众解决民生问题，提高生活水平，进一步促进中老双方在生态环保技术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云南在编制和完善环境管理规划、提高管理人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环保监测技术能力、改善学校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与老挝南塔省和琅勃拉邦省开展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联合开展了老挝南木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摸底调查，云南省专家团队指导南塔省完成《南塔省环境行动计划(2016—2020)》编制工作。

绿色澜湄合作样板持续释放新动能

云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周边国家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等多双边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为打造绿色澜湄合作样板做出有益尝试。

在过去 10 年间，云南与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湄公河国家建立

合作基础，共享合作机遇，持续释放澜湄环境合作发展新动能。

在《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与行动框架》下，云南积极与湄公河国家对话交流，组织实施环保技术援助、环境能力建设、公众环境意识提升等务实交流合作项目 10 余个，累计投资约 1315 万元。

自 2018 年以来，云南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联合举办 7 届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圆桌对话活动，促进澜湄国家官员、专家学者在环境政策、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加快澜湄流域绿色低碳发展步伐。

2024 年，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柬埔寨、缅甸、越南、泰国等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开创性的合作探索。云南与柬埔寨环境部自然保护区总局确认双边合作意向和合作可行性，计划为其提供必要监测设备开展澜湄流域重点断面水质监测，为做好澜沧江—湄公河水环境联合治理提供经验和技術支撑。分别与缅甸、越南驻昆总领馆就推动建立生态环境对话交流进行探讨，同意在双多边合作机制下，进一步强化交流互动，在跨境水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推动开展务实合作，落地实施一批改善周边地区民众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合作项目。

下一步，云南将以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为切入点，结合“小而美”示范项目，推动形成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和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来源：中新网）

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反思

庞卫东

(郑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肇始于英国占领槟城,其进程可分为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和马来西亚时期三个阶段。在殖民时期,英国人虽然开启了马来亚的现代化进程,却不可能使其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马来亚独立及马来西亚成立后,以巫统为核心的马来亚联盟成为执政党,开始主导马来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缘于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国国情的“五年发展计划”、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发展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未来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马来西亚仍面临伊斯兰教的现代调适和族群利益的调和两大挑战。

关键词: 马来西亚;马来亚;现代化;全球化;族群问题

现代化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但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各国既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又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作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较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走了不少弯路。总结和反思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曾掀起一股研究现代化的热潮,除重点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外,对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现代化都有所论及,但关于马来西亚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许利平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条件、工业化进程及其特点、教育现代化、现代化的前景等方面入手,对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初步探讨。李国强在对马来西亚现代化进行分期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其现代化初期的特征、成绩与难关,并认为马来西亚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人的现代化及贫富不均问题。两者都把马来西亚现代化的起点定位于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并且没有涉及近 30 年以来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发展情况。韩方明和李其荣重点论述华人在马来西亚现代化中的作用,马来西亚学者钟玉莲则进一步强调儒家思想应在马华文化中占据中心

地位,若能对其重新解释,则会对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大贡献。在英国卡迪夫大学任教的马来西亚学者伊扎蒂·阿齐兹深入探讨了后马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现代性,并以马来西亚为例,认为“现代”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法国图卢兹大学的吉恩·皮埃尔·普兰等人分析了现代化对马来西亚社会等级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最终对饮食模式和饮食风格的影响。

以上学者都是对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缺乏对马来西亚现代化的整体论述与评价。本文拟分三个阶段考察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马来西亚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分析未来马来西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现代化的定义与内涵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与内涵,前人多有探讨,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在此无意对众多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进行介绍和评论,而拟引入罗荣渠教授关于现代化的定义作为界定马来西亚现代化分期及相关分析的依据。罗荣渠把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涵义归纳为四大类:(1)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实质上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3)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在此基础上,他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

“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

参照罗荣渠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本文拟以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作为马来西亚现代化的起点。之所以选择此时而没有选择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这个更早的时间节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葡萄牙和荷兰仅在马来亚的沿海城市建立了商业据点,而没有深入马来亚内陆,虽在马来亚经营长达300余年,但对马来亚的社会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英国于1760年左右开始启动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不断在马来亚拓殖,建立了海峡殖民地,并逐步征服和吞并马来诸邦。在英属时期,马来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后来的新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上述现代化理论,本文拟将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86—

1945年英国殖民时期的现代化；第二阶段为1945—1965年独立时期的现代化；第三阶段为1965年至今马来西亚时期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内容来看，本文拟把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等要素作为观察变量，考察三个要素在马来西亚现代化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二、殖民时期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开启：1786—1945年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在航运、外贸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是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向中国出口棉花、布匹和鸦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保证此项贸易顺利进行，英国迫切需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贸易中转站。1786年7月，英国利用吉打遭到暹罗威胁的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和租金为条件，占领了槟榔屿。英国在马来亚拓殖的同时也开启了马来亚的现代化进程，对后来的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首先，殖民者引入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马来西亚政治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英式立法体系的引入对改造马来亚政治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的立法机构在组织形式和名称上有所不同、立法功能不够健全、实质也并非完全民主，但与传统的马来苏丹制相比，这种体制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趋势。立法机构的变化也反映了马来亚政治体制演进的轨迹。这种发展变化在二战前表现为非官方议员数目的增加，在独立进程中表现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会议中民选议员人数超过官方议员及官方委任议员的人数，从而为马来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独立奠定了基础。在引入新制度的同时，殖民当局对传统的苏丹统治体系进行改造，逐渐形成具有马来特色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为有效地实施引入的政治制度，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各地派驻军警，尤其是锡克教徒的士兵和员警，为政府正常运作提供强力支撑。此外，英国人还引入司法和监狱制度，以加强维持社会治安的力度。

其次，殖民者在开启马来亚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导致其经济畸形发展。为追求投资回报，外国资本主要投资橡胶种植和锡矿业，对工业和制造业的投入微乎其微，从而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对马来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锡矿和橡胶业的快速发展，交通、学校、医院、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逐渐奠定了马来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殖民者引入西方土地制度，特别是从澳大利亚引入托伦斯所有权(Torrens Title)制度，确保殖民者能够获取大量土地以建立种植园，使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马来封建经济模式趋向解体，转而形成具有明显殖民地特征的畸形经济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固然与马来亚的自然禀赋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英国对马来亚殖民地的定位——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和初级产品的来源地。正如高岱所言，殖民统治是作为外族统治存在的，殖民地工业发展政策都是为适应宗主国的经济利益而制定的。这就决定了马来亚工业发展从起步之日起就是不充分的，其直接

后果便是在马来亚未出现一种独立的、有调节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经济,而是形成一种适应西方市场需要的以锡矿和橡胶为特色的、片面的经济。

最后,在殖民时期,马来亚传统社会结构出现松动,思想文化趋向多元化。传统的马来亚社会是一个较为严格的等级制社会,上层是苏丹和贵族,下层是农民和奴隶,上下层之间很难进行社会流动。殖民统治大大加速了马来亚社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既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垂直流动,也包括地域迁徙上的水平流动。在印度人社区,水平流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人每年都在印度和马来亚之间往返;华人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其经济地位的变化相对较大。

在文化方面,英国殖民当局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三大族群能够相对完整地保留各自的传统文化特色。一方面,殖民者既没有在马来亚强力推行同化政策,也无意突出马来、中华、印度文化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且基本不干涉各族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殖民统治对马来亚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华人、印度人社区本质上是商业性社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不是看这个人的出身与血统,而主要看其拥有财富的多寡。即使是在较为封闭的马来人社区,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开始强调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出身。1905年,霹雳苏丹在出席马来学院年度颁奖典礼时致词:“一个人只要是苏丹的儿子就确定了他的前途的那种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即使是苏丹的儿子,除非他能求得知识来补充他的出身的高贵,否则其社会上就会没有地位。”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即使是苏丹也意识到一个时代已成为过去,马来亚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三、独立时期马来西亚现代化的转向:1945—1965年

1945—1965年是马来亚由殖民地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在此期间,由巫统主导的马来亚联盟逐步从殖民当局手中接管政权,并开始调整单一畸形的产业结构,发展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在文化方面,马来亚也逐渐由殖民文化向民族文化转变。

马来亚通过四次政治体制改革与斗争,初步建构了现代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第一次政治改革始于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二战后,英国建立的马来亚联合邦基本沿袭了殖民时期的统治体系。由高级专员出任政府首脑,兼任立法议会议长及行政会议主席;官方议员由行政官员出任,非官方议员由政党和商会推荐并经高级专员委任,政府的主要权力仍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为推进联合邦自治进程,殖民政府自1951年开始进行有限的立法机构改革,即逐步推行市议员民选制。1952年,殖民当局把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作为试点,首开马来亚民选市议员之先河。市议会由1名议长、6名委任议员和12名民选议员组成。在此次选举中,巫统和马华公会联合参选,获得9席;呼声较高的独立党仅得2席;另1席归独立人士。这次联合参

选的成功,为华巫两大族群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在联合邦各地的议会选举中,华巫合作参选,收获颇丰。与此同时,联合邦政府进行了机构调整,马来人和华人开始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议员民选和政府机构人员调整反映了权力转移的趋势,从而拉开了马来亚政府及议会改革的序幕。

1955年马来亚大选可谓这一时期第二次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随着马来亚社会治安局势的好转,各地民选议员制度稳步推进,殖民当局开始考虑联合邦立法议员选举之事。1953年7月15日,殖民当局成立立法会选举及修宪委员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于同年底制定选举草案。草案规定立法会由89人组成,包括议长1人,民选议员44人,官方议员、商会代表、委任议员等共计44人。按此规定,马来亚的行政权不仅由英国人掌控,议会也由高级总督把持。华巫联盟对此甚为不满,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核心主张为立法议员的3/5由民选产生。

1954年2-3月,殖民当局两度召开苏丹会议,最终拒绝华巫联盟提出的建议。华巫联盟在向英国殖民部申诉无果后,决定抵制此次选举,并令马来亚各地各级议会、政府机构中的华巫联盟成员集体辞职,致使马来亚的行政和立法机构立刻陷入瘫痪。华巫联盟还召开民众大会,向苏丹请愿,对当局施压。为平息马来亚的政治风波,英国首先将对华巫联盟持强硬态度的高级专员邓普勒调离,由副专员麦芝里接任。麦芝里随后同华巫联盟进行协商,达成折中方案。华巫联盟同意立法会选举延迟至1955年举行,政府方面同意按照白皮书建议,除52个议员由民选产生外,在保留的7个委任议员中,除防务司与经济部长外,其余5席由执政党推荐并由高级专员委任。1954年7月7日,华巫联盟宣告撤销抵制行动,继续与政府合作,并参加联合邦大选。

1955年7月27日,大选投票结果揭晓,华巫印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获得52个竞选议席中的51个,加上5个由执政党推荐的议员,以及商会和殖民地代表中的8个马华成员,联盟至少控制了89个议席中的64个。然而,东姑·拉曼首相领导的内阁只是一个“准内阁”,在联盟内阁中,英国人仍占据辅政司、律政司、财政司、经济部长和防务司等核心职位,且政府的运作还要受到高级专员的监督。

或许是难以忍受殖民当局的掣肘,以东姑·拉曼为首的联盟决定加速独立进程,从而开启了马来亚的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1955年8月,英国新任殖民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访问吉隆坡时,东姑·拉曼乘机向其提出独立问题,博伊德同意于1956年初在伦敦举行宪制会谈,但须征得马来苏丹的同意。在1955年9月底召开的苏丹会议上,东姑·拉曼对各州苏丹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最终取得8位苏丹(柔佛苏丹除外)的支持。

1956年1月,东姑·拉曼率团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独立谈判。双方最终于2月6

日达成协议,其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马来亚拟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独立后仍留在英联邦之内;二是实行马来亚化,联盟政府逐步从英国人手中接管各项权力。为实现“马人治马”,联盟政府增设财政及工商部长、内地防务安全部长及各种分支机构。与此同时,英国与马来亚委任以李特爵士为首的宪制调查团负责制定马来亚宪法。1957年2月27日,李特宪法草案及宪制调查报告公布,除规定语言、教育、国教等问题外,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公民权问题,即凡马来亚的华人和印度人,只要放弃原国籍,并宣布效忠马来亚,都可以成为马来亚公民;二是马来人享有某些特权,即马来人在“保留地”、政府职位“配额”(马来人约占4/5)、商业执照、奖学金方面享有优先权。实际上,这是华人和印度人以承认马来人的特权为条件换取在马来亚的公民权,马来西亚族群不平等的基本格局自此形成。

第四次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马来西亚的成立与分裂。二战后,英国重返马来亚,把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行政权集中起来,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则从海峡殖民地分离出来,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新马虽被分隔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但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马来亚、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成立后,联邦内隐藏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在合并近两年后,新加坡被迫退出马来西亚,两国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由于新马均以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为模板,因此马来西亚的成立与分裂并没有导致两地原有政治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体制在此阶段逐渐呈现出威权政治的色彩。陈晓律认为,这种体制是民主与独裁的混合物,“它的政治基本框架大体上是民主的,它有着通过选举产生的国会,有着合法的选举程序,有着独立的司法机构,但与此同时,民主的结构却伴随着广泛的权威控制,使得政治上的反对派不可能有效地在选举中通过合法的方式推翻执政党。”虽然这种威权政体一直广受非议,但它对新马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构建了一套相对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且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独立时期,马来亚经济开始了由殖民地经济向现代国民经济的转型。政府除继续扶持锡矿和橡胶业的发展外,还积极发展工业和制造业,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发展纺织、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马来亚政府于1958年开始实施“新兴工业法案”,并规定凡此前未曾设立的工业或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工业都可以获得税收优惠、信贷与财政支持。新兴工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期为3-5年,若这些企业能够为国家出口创汇,还可延长税收优惠的期限。在政府的鼓励下,马来亚制造业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1%,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10%增长到1970年的

17%。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以华人银行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与战前不同的是,战后华人银行逐步以现代西方银行的信贷关系取代旧式信贷关系,冲破了华人“帮”的束缚,扩大了银行资本和业务范围,为马来西亚新兴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这一时期,马来亚的产业经济结构虽有所优化,但族群和阶层经济结构却没有太大变化。马来亚独立后,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建设。由于华人企业经济基础较好,且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成熟的商业网络和便利的融资渠道,华人经济在独立后初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华人经济的崛起也与英国资本的退缩有一定的关系。在马来亚独立过程中,一些英国的橡胶园主和锡矿主担心企业被收归国有,遂将部分企业和胶园分割转卖给华人。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马来亚政局的稳定,以英国资本为代表的外资加大对马来亚的投资力度,外资在马来亚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再次提升。总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以前,马来亚的族群经济基本呈现金字塔形状,英国企业数量虽不多,但占据塔顶;华人资本居于中间,但规模有所扩大;马来人仍处于底层,经济状况没有太多改善。由于政府没有及时进行税收调节和行政干预,族群之间及族群内部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这就为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埋下了隐患。

独立时期,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马来亚在文化方面逐渐由殖民文化向民族文化转变。这种转变突出反映在认同、语言和教育方面。由于文化、宗教信仰、职业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马来亚三大族群之间交往较少,各自保留独特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并分别产生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三类民族主义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马来民族主义表现为内向型,扎根本土,积极参与马来亚的政治运动;华人民族主义和印度人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外向型,更关注中国与印度的政治局势。由于三者政治认同的目标各不相同,战前马来亚的民族主义没有跨越族群樊篱,发展成为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战后,英国在实施马来亚联邦计划时,拟把公民权广泛授予非马来人,引发了关于国家认同的争论。当时,广大华人和印度人对公民权相当冷漠。马来亚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华人可以自由经商、居住和流动,因而没有认识到取得马来亚公民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时,多数华人在潜意识中依然以中国人自居,在政治方面仍然认同中国而非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认同情况与此相似。大部分马来人视马来亚为自己的家园,极力反对将公民权广泛授予非马来人,并在巫统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最终迫使英国人放弃将公民权广泛授予非马来人的计划。而公民权问题直至马来亚建国时,以华人和印度人承认马来人的特权为前提才得以解决。

民族语言也是独立时期争论的焦点之一。马来民族主义者相信,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只有马来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他们才能够分享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马来作家、记者、评论家通过报纸和杂志宣传马来人与华人在经济上的差距,刺激马来人心理上的恐惧,并强调语言之争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关系到马来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以巫统为首的联盟政府在处理此问题时也颇为矛盾。联盟的核心决策者多毕业于英校,深知英语是不同族群孩子交流沟通的工具,英校也是未来精英的培育基地,但考虑到广大马来人对语言的看法,也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因此,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宪法第125条规定,马来语将在10年后成为马来亚的唯一官方语言。

为强化马来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马来亚除开展国语运动外,还在教育领域推行强力改革。1961年10月,国会不顾华社的强烈反对,通过了依据《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而制定的《1961年教育法令》。根据此法令,自1962年起,全国中小学分为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和私立学校三种类型。只有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学校才可以获得政府的全部资助,否则就成为私立学校。为实现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亚全面实施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制度,并规定国民型小学在必要时可改为国民小学。教育部正是依据此项法令,从1968年开始把英文小学和英文中学逐步改为国民学校。教育领域“去英语化”的进程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

四、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1965年至今

1965年8月新马分离后,马来西亚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从空间来看,新成立的马来西亚不仅包括原来西马各州,还包括东马的沙巴和沙捞越,东马两州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与西马各州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使得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更趋复杂。从时间来看,马来西亚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各有自己的时间节点,两者并不同步,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更不易找到明显的时间节点,更多地以人口、婚姻和性别秩序等现象表现出来。

自1965年以来,马来西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及对应的重大事件,分别是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和201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五·一三”事件是马来西亚长期积累的族群和政治矛盾的大爆发。在独立时期,联盟政府采取了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发展政策,马来人拥有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华人则可以在经济领域自由发展。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华巫两族对现状都颇为不满:面对经济落后与政治主导的鲜明对比,马来人强烈要求政府对其经济活动予以扶持;而华人在获得公民权后,则进一步希望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双方潜在的矛盾在1969年国会大选后被迅速放大,最终导致了冲突的爆发。

“五·一三”事件宣告了东姑·拉曼温和的族群平衡政策的破产。冲突爆发后不久,以拉扎克为首的国家行动委员会接管政权,并于1971年2月提出宪法修正案,禁止公开讨论马

来语、马来人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特权、公民权等敏感问题,努力纠正族群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此后,拉扎克政府在政治上实施联合缔造战略,并通过三大步骤建立了多党联合的稳定政府。

首先,将东马两州的主要政党纳入联盟体系,并逐步将联盟扩展为国民阵线。在1970年的沙捞越大选中,沙捞越联盟(土著党、砂保守党与砂华公会)共获得24席,两个反对党中,沙捞越国民党获12席,沙捞越人联党得11席。沙捞越人联党最终被说服与沙捞越联盟结盟,共掌砂州政权。1974年,沙捞越国民党也被吸收进入国民阵线。在沙巴,首席部长穆斯塔法领导的沙巴联盟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州内几无有影响力的反对党。1974年,拉扎克说服穆斯塔法让沙巴联盟加入国民阵线,同时又在沙巴扶持成立了沙巴人民团结党,该党于1976年赢得沙巴州议会选举。

其次,争取其他华基和印基政党的支持。由于马华和印度人国大党在1969年大选中失去大量选票,出于扩大选民基础的考虑,联盟有意拉拢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前者是以檳城为基地、主要依靠华人选票的政党,党魁为马华第二任主席林苍佑医生;后者的前身为霹雳进步党,最初由印度裔辛尼华沙甘兄弟领导,主要成员为印度人和华人。尽管马华与印度国大党强烈反对联盟吸收两党,但在拉扎克的斡旋下,两党最终加入联盟体系。

再次,加强马来政党的团结。“五·一三”事件后,巫统认识到,若马来人想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马来政党必须团结一致。当时,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是在野的、实力最强的马来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获得12个国会议席、38个州议席,并重新夺回吉兰丹州的执政权。为了团结伊斯兰党,拉扎克以极大的耐心与伊斯兰党主席穆罕默德·阿什·穆达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973年1月达成协议,伊斯兰党于1974年6月1日正式加入国民阵线。

1974年5月30日,拉扎克宣布,由九个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国民阵线正式成立。至此,拉扎克领导的联邦政府完成了对马来西亚政党体制的又一次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大联盟政党体制。这种政党制度既非一党独大,也非多党竞争,而是两者的结合。巫统在国民阵线的主导地位明显具有一党独大的特点,国民阵线内部与外部政党之间又形成了多党竞争的格局。一党独大有利保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多党竞争的格局又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体制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直至2018年国会大选。

2018年国会大选是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分水岭:以巫统为主导的国民阵线在大选中败北,希望联盟以反对党身份组阁,完成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虽然大选后联邦政权实现了平稳交接,但由此引发的政治余震不断冲击马来西亚政治结构,使其政

局更加扑朔迷离。希盟虽然成功组阁,但内部矛盾重重。马哈蒂尔首相无意在两年后向安瓦尔交权,希盟内部围绕交接问题公开分裂,土团党主席穆希丁与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乘机联合反对党发动“喜来登政变”,导致希盟政府垮台。国阵、伊斯兰党、沙捞越政党联盟组成国民联盟,推举穆希丁担任首相。此时,马来西亚国内政党林立,各党派之间及党派内部因利益而不断地进行结盟与斗争,穆希丁后来也因失去巫统的支持而被迫下台。2021年,伊斯迈·沙比里出任首相,国民阵线再次掌权。然而,在2022年的第15届国会大选中,无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党联盟获得下议院半数以上选票,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出现“悬峙国会”。2022年11月,希盟最终成功拉拢国阵、砂盟等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目前,安瓦尔政府仍处于磨合期,依然面临着各种内外挑战,此届政府能否平稳运行,仍有待观察。

经济现代化是马来西亚现代化的最突出成就。“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侧重发展电子电器、车辆装配等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及经济实力的增强,马来西亚开始转向发展重工业及金融业。经过50余年的发展,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明显优化,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均有显著提升。从经济结构上看,在1970年之前,马来西亚以进口替代为重点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对纺织业、食品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制造业投资较多,为国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0—2000年,农业在马来西亚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的比重则快速增长,2000年之后开始下降。这大体符合亚洲各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马来西亚经济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自建国后,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较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来西亚的区位、资源优势以及与英美等国的良好关系。马来西亚的服务业起步于零售业、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传统的服务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成为推动马来西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马来西亚在巩固原有服务业的基础上,又提出发展以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促使服务业向高价值和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变。

马来西亚经济现代化的成就还可以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对比来观察。从纵向来看,自1965年以来,除七个年份出现明显下滑以外,马来西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见图1),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9.6亿美元(以当前美元计价)增至4063.1亿美元(见表2),年均增长率为5.98%。马来西亚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的七个年份分别对应1975年石油危机,1982—1985年橡胶、原木、石油和棕榈油等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1998年经济危机及余波(2001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见图2)明显反映出:马来西亚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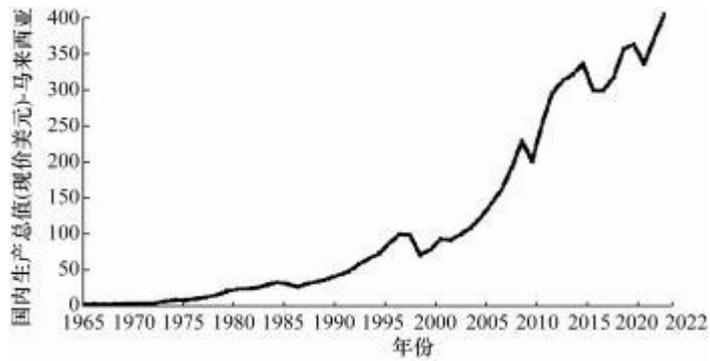


图 1 马来西亚 GDP 实际增长曲线图(1965—2022 年)(单位: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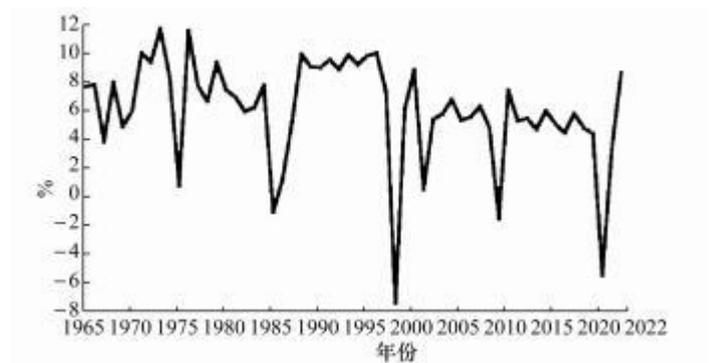


图 2 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曲线图(单位:%)

在横向方面,可以将马来西亚与邻近的新加坡、泰国、印尼以及中国进行对比,通过 GDP 总量、人均 GDP,以及这两项的年均增长速度来衡量马来西亚经济现代化的规模、速度与量。

从表 2 可知,虽然当前马来西亚 GDP 总量最小,但其增长速度并不慢,居中国与新加坡之后,略高于印尼和泰国。若以人均 GDP 来看,新加坡遥遥领先,稳居亚洲第一;目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相差无几,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远远高于相邻的泰国和印尼。尽管人均 GDP 并不能完全反映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却可以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参照指标之一。就人均 GDP 增速而言,马来西亚在五国中处于最后一位,反映出这一时期马来西亚人口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受城镇化、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增长的人口中,马来人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华人和印度人。

表 2 中马新印泰五国 GDP 总量、人均 GDP 及增长速率对比表

(GDP 总量单位为亿美元,人均 GDP 单位为美元)

		1965 年	1975 年	1985 年	1995 年	2005 年	2015 年	2022 年	年均增速
马来西 亚	GDP 总 量	29.6	93	312	887.1	1435.3	3013.5	4063.1	5.98%
	人均 GDP	325.2	800.4	2065.1	4405.1	5536.8	9699.6	11,971.9	4.56%

新加坡	GDP 总量	9.7	56.3	191.6	878.1	1278.1	3080	4667.9	7.02%
	人均 GDP	516.5	2489.9	7001.8	24,914.9	29,961.3	55,645.	82,807.6	4.83%
印尼	GDP 总量	91.5	304.6	852.9	2021.3	2858.7	8608.5	13,200	5.33%
	人均 GDP	53.3	232.2	514.4	1020.1	1249.4	3322.6	4788	5.36%
泰国	GDP 总量	43.9	148.8	389	1692.8	1893.2	4013	4953.4	5.4%
	人均 GDP	141.9	363.8	768.9	2848.6	2876.2	5708.7	6908.8	5.09%
中国	GDP 总量	704.4	1634.3	3094.9	7344.8	22,900	110,600	179,600	8.38%
	人均 GDP	98.5	178.3	294.5	609.6	1753.4	8016.4	12,720.	5.62%

说明:印尼 1967 年之前的 GDP 数据缺失,故以最早的 1967 年的数据代替。年均增速系笔者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马来西亚国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人口出生率、婚姻及性别观念等多个方面。第一,从 1970 年到 2020 年,马来西亚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粗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32.4% 降至 2020 年的 14.5%。通常来讲,马来人受伊斯兰教不生育观念的影响,人口出生率较高。然而,从数据上看,即使是在土著居民占 95% 以上的吉兰丹和登嘉楼,出生率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前者的出生率从 1970 年的 36.3% 降至 2020 年的 20.2%, 后者的出生率则从 34.9% 降至 23.6%。就总和生育率来看,马来西亚的总和生育率从 1980 年的 4.0 降至 2020 年的 1.8, 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总和生育率也分别从 5.2 和 5.5 降至 3.0 和 3.2。

第二,马来西亚国民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女性尤其是马来女性的初婚年龄大幅上升。20 世纪 50 年代,半岛马来人几乎是普遍的早婚、一夫多妻和高离婚率,这也是当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常见模式。自独立以来,马来女性结婚的中位数年龄急剧上升,已从 1957 年的约 17 岁提升至 2021 年的 26 岁,夫妻年龄差距缩小至 2 岁。离婚率和一夫多妻率急剧下降,目前马来人的离婚率已经降至 1.5%,但仍高于非马来人的离婚率(1.1%),一夫多妻的比例也降至 5% 以内。婚姻模式的急剧变化反映了马来西亚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变化。

第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马来西亚的性别秩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父权制社会已出现松动。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传统马来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妇女在城市中的就业人数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妇女也开始进入政

坛,发挥重要影响力。在2022年第15届国会大选中,入选的女性国会议员人数已达13.5%,在政府内阁中共有5名女性部长和8名女性副部长,占内阁部长的23.6%。尽管女性参政的各项指标距马来西亚政府设定的“让女性占30%决策权”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的地域、阶层、族群和宗教中,性别平等已成为主流话题。

五、对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近代以来,马来西亚经历了200多年的现代化实践,既走过了许多弯路,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殖民时期,马来亚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主导权由殖民当局掌控。从政治角度来看,殖民者虽引入了英国的行政、议会、司法体系,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革,掌握马来亚实权者仍是英国人,各邦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小,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参与政治决策。从经济角度来看,殖民统治虽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为马来亚的早期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由于经济的片面发展,马来半岛成为单一畸形的经济区,粮食不能自给,以锡矿和橡胶为主的出口经济完全服从于宗主国的需要,并且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尽管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必须看到这种积极的后果并非殖民者有意计划的结果,而是为促进殖民者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副产品。从根本上讲,在殖民时期,马来亚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全面、深刻的现代化。

马来亚独立及马来西亚成立后,以巫统为核心的马来亚联盟成为执政党,开始主导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经过60余年的发展,马来西亚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讲,马来西亚多年来政局较为稳定,除“五·一三”事件外,几乎没有出现过重大政治动荡,这在东南亚国家中较为少见。2018年国会大选后,联邦政权实现了平稳交接,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马来西亚政体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马来西亚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在长期的议会选举过程中,借鉴西方政党运作经验,依据国情进行体制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政党联盟体制。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成就更为突出,经过12个“五年发展计划”,马来西亚经济实现了从以农业为基础向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转变,在产业结构、GDP总量、人均GDP、教育、医疗、就业、人口平均寿命等多方面都有大幅度提升,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预期目标。

马来西亚现代化的成就是内外多种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多方位的解读。

首先,马来西亚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五年发展计划”,主导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或许是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马来西亚从独立后就开始制定“五年发展计划”,确定经济优先发展领域、发展目标、实现路径等。从总体来看,这些计划的执行效果

良好,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成效尤为明显。这一时期,绝对贫困率的大幅下降和土著居民大量进入现代商业部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基本实现了“新经济政策”的目标。目前,马来西亚正在执行第12个“五年发展计划”,并将发展人力资本、采用新技术、加强基础设施连通性、加强公共服务作为发展重点。

其次,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马来西亚的发展计划一直强调经济增长和公平,以确保社会财富能够在国民中得到公平分配。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数据,马来西亚仅有不到1%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90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线以下,只有2.7%的人口生活在5.50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平均贫困线以下。马来西亚学者穆罕默德·B.尤索夫等人认为,贫困率下降应归因于主要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工业的增长,以及穷人在非农业部门就业能力的提高。尽管农业部门的就业率呈下降趋势,但政府继续执行扶持政策,通过机械化和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马来西亚消除贫困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贫困的马来人中建立可行的工业社区。政府通过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创业方案和商业开发方面的培训,使马来人能够广泛参与现代和商业经济部门。

再次,发展高质量的教育。许多研究表明,教育是重要的内生生产要素,可以助推国家的经济发展。独立以来,马来西亚非常重视教育的现代化,对教育领域的投入持续上升。1957年,教育占马来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8%,至1980年已上升到5.6%,仅次于国防开支;至2022年,马来西亚的教育支出达526亿林吉特(约120.5亿美元),占联邦总支出的16%,高居联邦政府支出的首位。在教育发展策略方面,政府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向国民提供11年中小学免费教育。为满足工业发展需求,马来西亚独立后开始发展职业教育。经过60余年的努力,马来西亚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过,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政府投入有限、多头管理及多种证书标准,职业教育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分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发轫于1959年设立的马来亚大学吉隆坡分校。至2024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包括20所公立大学、36所理工学院、105所社区学院和390所私立学校。过去20年,虽然马来西亚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资源显著增多,但效果还未完全显现。马来西亚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仍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地区和社会经济差异持续存在,自动化对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威胁越来越大。

最后,借助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全球化有力地推动和塑造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包括贸易、资本、劳动力迁移、技术和信息流动,都给马来西亚的经济和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国际贸易、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国劳动力,马来西亚实现了从高度依赖出口初级商品(锡矿和橡胶)向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全球化在马来西亚经济

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早期阶段,马来西亚借助全球化的机会,大力引进外资、技术和人力,使经济快速发展,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在后期阶段,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过度依赖低技能外国劳动力损害了经济的竞争力,经济的开放性也使其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战后的四次全球经济危机都对马来西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全球化带来一定的风险,由于马来西亚经济规模较小,“去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明智选择。正如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峰锦所言,从政策角度来看,马来西亚需要更高效的机构和政策工具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结 语

自独立以来,尽管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取得了突出成就,但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单就经济发展而言,马来西亚早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中上等国家的收入水平,但20多年过去了,如今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统筹兼顾,又需要抓住关键问题。从长期来看,马来西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调适。过去30年,与马来西亚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深化,从金融到法律、从着装到教育,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影响都在加强。伊斯兰教影响的强化与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马来西亚政府重视伊斯兰教的宣传与推广、巫统与伊斯兰党的竞争皆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以伊斯兰党为代表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势力强势崛起,该党在2022年国会大选中一举拿下43个席位,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拿下吉兰丹、登嘉楼和玻璃市三州。伊斯兰党要求在其执政的地区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这必然带来宗教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借用王铁铮对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忠告,马来西亚政府需要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本土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点,从世界现代化的丰富经验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使现代化成果惠及各个族群,从而推动马来西亚社会全面发展,避免在文明演进和新的征程中迷失方向。

二是妥善处理族群问题。族群问题特别是华巫族群矛盾可谓困扰马来西亚发展的头号政治问题。“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缩小族群经济差距的政策,并通过实施各种法令来控制 and 减少族群、宗教负面观点的传播,使华巫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然而,族群不平等的宪法和制度根源并没有消除,新生代华人和印度人在现代平等观念的影响下,难以真正认可马来人享有的特权,马来人则认为其理所当然地拥有特权,以致双方形成了难以化解的心理矛盾。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马来西亚的族群议题被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网络成为舆论激烈交锋的战场。由于马来西亚一直存在基于族群和宗教的政党,每个政党都希望捍卫各自族群的权益和地位,导致族群、宗教、文化等议题很容易走向政治化。

据大马社会传播中心发布的 2022 年大马族群歧视报告, 获媒体和社交媒体报道的族群歧视事件数量从 2021 年的 53 宗上升至 2022 年的 82 宗。由此可见, 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和谐社会的建构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来源: 东南亚研究, 2024 年第 5 期)

◎热点分析

东盟在时代变局中的坚守与开拓

东盟 1967 年成立后，面对着复杂国际局势，却创造了“东盟奇迹”。东盟不仅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和平与合作方面成绩斐然，也为更广泛的东亚地区和平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10 月 11 日，第 44 届和第 45 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老挝落幕。在峰会上，东盟多国领导人展望东盟未来发展的新愿景，希望东盟更加强大、更具韧性，在区域合作中保持中心地位。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栉风沐雨，已创奇迹

笔者写本文时再次翻阅了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硕与孙合记的合著——《东盟奇迹》，看着他在书上的签名和赠言（“最良好的祝愿”），回想起 2017 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东盟奇迹》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当时马凯硕先生意气风发地论述东盟奇迹以及东盟美好前景。笔者结合他的观点以及自身研究，总结的“东盟奇迹”至少有以下几点：

历经国际风云变化，面对外界的质疑（有人认为其是“清谈馆”、效率低），东盟始终负重前行，在持续坚守中展现出极大韧性和吸引力。东盟 1967 年 8 月 8 日成立时，冷战正酣，美苏在东南亚激烈争斗。东盟经历了越南战争、柬埔寨问题、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现在面临着“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激烈又给东盟带来了新挑战。然而，东盟韧性十足，东盟成员国从 5 个扩充到 10 个（东帝汶有望成为第 11 个成员国），却从未有成员国要退盟。而且，东盟 2015 年底宣布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引领的东南亚以及东亚的区域合作蒸蒸日上，得到诸多域内外国家和组织的认可和参与。东盟上述有些成就是其他区域合作组织很难做到的，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深陷困境数年，英国则脱离了区域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

东盟的成功表明，差异性很强的地区国家间是可以实现长期和谐共处、和平与合作的，这给其他区域提供了宝贵案例。东盟国家在规模、族群、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甚大，东南亚是世界上罕见的有如此多文明共处的地区，而东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长期和平，亦即，加入东盟的国家之间未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虽然部分国家有小摩擦，例如泰国柬埔寨曾因柏威夏寺在边境有过小冲突）。原因是，东盟长期倡导并践行“和平与合作的理念”，在 1976 年东盟首次首脑会议（东盟峰会前身）上，五国首脑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要求缔约国要有决心和诚意防止出现争端，如发生争端，应当克制，不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胁，应通过友好磋商加以解决等等。东盟取得的上述“奇迹”在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是较难出现的。《东盟奇迹》一书有个副标题——“和平的催化剂（A Catalyst for Peace）”，马凯硕说，东盟已经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和平红利，其非凡的成就是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东盟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东盟成立后，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合作，东盟总体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关系较好，因此其长期吸引大量外资。例如，据10月9日发布的《2024年东盟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2300亿美元。东盟连续三年在吸收外资方面实现增长，巩固了其作为发展中地区最大FDI目的地地位，占全球FDI流入量的17%，高于2022年的16.5%。这也凸显出东盟作为全球金融服务、数字服务以及制造业枢纽的地位不断提升。总之，东盟推动了成员国发展，改善了东南亚6亿多人的生活水平，这是重大成就。

奋楫扬帆，赓续前行

今年10月的东盟峰会主题为“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峰会审议了《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落实情况和东盟共同体建设进展，与会各方围绕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就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议题深入探讨，审议并通过了90多项成果文件。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总理宋赛在峰会闭幕后表示，《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将为制定“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到2045年建设一个有韧性、创新、充满活力和以人为本的东盟共同体。从峰会看，东盟未来发展重点方向有：

加强东盟内部团结协作，强化组织韧性，强化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如果内部缺乏团结，东盟势必陷入困境。所以，在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在全球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必须勇敢地向世界发出团结的明确信号。他呼吁东盟十国加强地区合作，避免内部冲突和分裂。泰国总理佩通坦表示，东盟必须在影响该地区及其人民的问题上采取有原则但不选边站的立场。

强化联通。对东盟而言，加强区域联通和共同体建设永远在路上，这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在内的物理联通、规则机制联通、人员联通等方面，也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而东盟强化联通既包括强化东南亚内部联通，也包括强化其与诸多伙伴国的联通。

加强创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智能化技术的突破，这为东盟带来新发展机遇。东盟多国近年来提出工业4.0战略，包括推

动数字化转型以推进产业升级，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等。越南总理范明政在 10 月的东盟峰会上强调，创新是东盟跟上地区和世界的步伐并与地区和世界接轨的主要驱动力和动力，因此东盟须加强合作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加强地区数字合作框架建设，优化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技术的治理能力等。目前东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预计于明年底达成，这将可能是世界上首个区域数字经济协议。专家预计，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实施将在 2030 年前为东盟新增 1-2 万亿美元的产值。此外，近年来，东盟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半导体和芯片等新兴领域吸引了大量投资，将助推东盟产业升级。

东亚合作，引领力量

东盟方式，惠及四方。东盟在长期推动区域合作中形成了东盟方式，其内涵包括：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和平解决争端等等。而且，东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是开放包容，欢迎域内外国家参与。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部分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浪潮，导致全球治理难度上升。因此，区域合作、区域治理的重要性上升。东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引领的东亚合作在地区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凸显。

政治层面，东盟轮值主席国每年都召开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相关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等数百场甚至上千场会议，东盟已与联合国、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等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对话关系。东盟在推动跨区域和全球治理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东盟推动下，首届亚欧首脑会议 1996 年 3 月在泰国召开，该会议每两年轮流在亚欧国家举行一次。亚欧会议有 50 多个成员，成为亚欧间重要的跨区域政府间论坛，增进彼此合作。

安全层面，东盟在应对地区传统安全挑战以及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也是为数不多的有朝鲜代表参加的地区合作论坛，现有 27 个成员。在朝鲜半岛局势时而紧张的情况下，东盟地区论坛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凸显。

经贸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于 2023 年 6 月生效，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而该自贸区是东盟发起建立的。

虽然东盟在推行“大国平衡外交”方面长袖善舞，但在新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亦遇挑战。

第一，内部团结遇到一些问题，例如，缅甸局势等问题引发东盟成员国内部的长期分歧，影响团结。外部挑战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推行“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在地区构建

“奥库斯”同盟,推动北约更多介入亚洲事务(日本新首相石破茂还主张建立“亚洲版北约”),推动南海问题升温,对东盟内部凝聚力、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及其推动的区域合作构成较大挑战。

而且,近年来,由于世界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持续,使东盟举办多边会议时遇到更多困难。例如,2022年东盟举办东亚峰会、G20领导人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等国施压东盟相关会议主办国,要求其不要邀请俄罗斯代表参会,但遭东盟国家拒绝。此外,东盟举办的东亚会议等会议有美俄代表参与,主办国在安排相关国家代表住宿、交通、会场座位等问题上较为难办,或者是会后只能发布“主席声明”而难以发布“联合声明”,因为东盟难以促成所有与会国就会议议题达成一致立场。今年老挝主办的部分峰会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正因如此,在10月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多国领导人强调东盟要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印尼副总统马鲁夫还指出,东盟推出了“东盟印太展望”,其作为区域合作指南,巩固了东盟的中心地位。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则表示,在世界陷入地缘政治竞争等背景下,东盟更需要加强区域一体化,并确保在国际舞台上能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总之,东盟是国际舞台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而马凯硕曾说,“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就来东盟看看吧”。在10月的东盟峰会上,范明政强调,东盟正准备以新思维、新视野、新动力和新姿态进入新发展阶段。2027年将是东盟建立60周年,东盟有望再创新奇迹,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文来自:东南亚学人)